

#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李桂梅

摘要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阶段,它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体现为它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男性思想家发挥启蒙作用;关注妇女的社会权利。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妇女饱受压迫和摧残。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既把中国社会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也把中国妇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的深渊。为挽救民族的危机和谋求自身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解放,中国妇女与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戊戌维新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些妇女解放运动都大大促进了中国妇女的觉醒,促使中国人的男女角色观念和家庭生活发生了变化。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伴随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自身的时代特点。

## 一、妇女解放运动同挽救民族危亡的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

近代资产阶级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从“保国、保种、保教”出发,注意到了国家积弱同妇女的关系,他们认为妇女缠足,便不能生育健壮的后代。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梁启超认为,国家积弱,是由于“分利”的人太多,妇女由于没有学识,以致没有职业,都成了分利的人。因此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兴办女学。中国人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强烈意识到“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sup>①</sup>“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

失,无业众,智民少,国所以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sup>②</sup>虽然把女学兴盛看作国家强弱之本源论有些偏颇,但足以看出兴女学的重要性。维新派把妇女解放看成了维新事业的组成部分,并选择了“禁缠足”、“兴女学”作为妇女解放的突破口。他们解放妇女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出于对妇女命运的关心,而是为了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

辛亥革命派更是把争取女权纳入反清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之中。孙中山把男女平权作为他民权思想的组成部分加以倡导,也是他的政治思想——三民主义不可缺少的内容,并在同盟会的政纲规定了“男女平权”的条文。革命派的思维逻辑是,要解放妇女,首先必须反对君权,推翻君主政体,这就必须发动妇女参加争取民权的革命运动,金天翮在《女界钟》里说到:“民权与女权,为蝉联附萼而生,不可遏制”,并呼吁妇女“起来参加革命,救国救民”,以“爱国与救世”为公德,“为造就新国民,组织新政府而奋斗”。他们已把妇女解放同民主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号召妇女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的影响下,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进一步提出了奉献平等,认为妇女要取得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就必须同男子一样,共担救国之义务,同尽爱国之天职,这是与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背景相关的。中国妇女开始认识到要争取自身权利和人格独立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这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感和责任意识。维新时期妇女在《女学报》上写道:“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辛亥时期的妇女将这种爱国情感和责任意识变成了她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她们与男子并肩作战,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五四运动时期,尤其是“六三”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范围扩大到女学生、女教师、职业妇女、宗教团体妇女、家庭妇女及其他一些劳动妇女之中,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本质区别的就是无产阶级劳动妇女参加斗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生力军,她们把妇女解放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

自西周以来,宗法社会和家族主义就是传统中国的一大特色,中国传统伦理规范主要集中于家庭伦理。三纲之中,除了“君为臣纲”之外,“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属家庭伦理。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庭伦理渗透了浓厚的封建主义的毒素,它已经不只是协调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一定程度上成为确定尊卑贵贱的思想枷锁,因而打破旧的家庭伦理的束缚,也就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戊戌维新时期人们对传统的三纲五伦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谭嗣同认为“三纲”如同地狱,自当废弃;而“五伦”之中只有“朋友”一伦合乎“平等”、“自由”思想,“不失自主之权”,其余四伦都应“以朋友之道贯之”<sup>③</sup>。这里自然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应以朋友之道贯之,即男女平等,他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应以平等为基础,“伦常亲疏,自然而有,不必严立等威而苛持之也。”<sup>④</sup>“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时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sup>⑤</sup>

康有为认为旧的家庭伦理的根基与核心就是夫权,它是产生男女不平等的直接原因,而封建宗法关系,是男女不平等的间接根源。因此康氏力图完全否定旧家庭伦理以实现男女平等。他确信在大同之世,男女完全平等独立,婚姻绝对自由。

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主张家庭革命,重铸家庭伦理,他们所谓“家庭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改变不平等的三纲五伦,尤其是男女不平等。指出要变“夫尊而妻卑”为“夫妇平等”,“拔千万女同胞于家族之火坑,而登之莲花之舞台也。”<sup>⑥</sup>主张“祖宗革命”、“纲纪革命”,使生人从死人的余威中解放出来,令活人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关系。

针对中国牢固的家族主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提出了偏激的“毁家论”,在他们看来“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自有家而后女子曰受男子羁縻”,因而“社会革命”当以“毁家”为“拨本塞源之计”。<sup>⑦</sup>这种毁家论与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一样具有空想色彩,也体现了家族主义残酷压迫下人们的逆反心理。

五四时期发展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思想,但在批判封建家庭伦理、妇女解放等方面更富有理论色彩,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将在宣传西方伦理和女性解放的观念方面占有突出地位。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已不限于“民主共和制”,而是要求在一切实社会生活之中贯彻民主精神。因而五四时期强调个性自由和解放,强调人格独立。这表现在陈独秀批判旧的纲常,鲁迅、周作人宣传日本思想家的贞节观,胡适介绍易卜生主义。陈独秀抨击“三纲”之说,是因为这些旧道德使天下为臣,为子,为妻者“无独立之自主之人格”。<sup>⑧</sup>最能体现五四改造家庭伦理问题的思想特色,对女性解放思潮起巨大推动作用的是胡适的提倡的“易卜生主义”。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号”,刊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易卜生的剧作《娜拉》(即《玩偶之家》)。胡适指出:“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sup>⑨</sup>胡适宣传易卜生主义,对五四时期的家庭伦理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先进知识分子在继续批判旧的纲常伦理时,对于新的家庭伦理规范有了更明确、深入的认识,他们提出了家庭改革的主张。第一,将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改为一夫一妻及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子家庭;第二,家庭中男女平等,子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和财产继承权;第三,实行一夫一妻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制度。五四时期家庭伦理的变革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当时到处上演《娜拉》,高叫着‘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声。”<sup>⑩</sup>男女社会公开,婚姻自由成为青年学生的时髦,男女平等已成为五四时期社会开明人士的主流。

中国妇女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的认识,首先是来自她们自身对封建婚姻家庭生活的痛苦感受。因而要动员妇女起来革命,批判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则是一个突破口。但要真正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平等的

家庭伦理观念和规范还需要经济、政治等条件做保障。现代妇女解放不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通过革命斗争改造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社会环境,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的彻底解放。

### 三、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男性革命家和思想家发挥启蒙作用

近代作为群体觉醒并积极倡导女性解放的首先是戊戌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正是他们将斗争的锋芒直指封建的伦理纲常,直接指向夫权和宗法关系,从而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但最终因变法失败而告终。20世纪初女性解放运动又掀起高潮。但依然是男性带头,1903年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梭”的金天翮继承维新志士的创新意志,怀抱拯救妇女脱离苦海的愿望,著成《女界钟》一书。他在书中认为20世纪是“女权革命的时代”,这本书猛烈抨击了封建中国奴役女性的旧思想、旧制度、宣传男女平等观点,敲响了女界革命的钟声。辛亥革命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妇女解放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但最终妇女并没有得到她们理当得到的权利,五四时期男性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吴虞、毛泽东等,他们从人的解放和伦理解放的视角来指导女性解放,其理论更系统,思想更深刻。而当这些思想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妇女问题,更是为妇女解放指明了方向。

不仅如此,近代思想家和革命家还在行动上也作了榜样,维新派亲自兴办了禁缠足会和女学堂。民初资产阶级上层政治集团的代表宋教仁、唐绍仪、汪精卫等人组织了“进德会”、“六不会”和“社会改良会”,它们是改造社会陋俗和女性陋俗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想通过改革陋俗来培植国民“自由”、“平等”、“人道”、“人权”的思想意识。五四时期的社团主要是由青年男子组成并在其中发挥着较大作用,如北京的少年学会、觉社,河南的青年学会、浙江的永嘉新学会、上海的新人社等社团,都竭力要求平等,提倡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同校、婚姻自主、废除娼妓等<sup>①</sup>。

当然近代社会中也有不少女性在男子的宣传鼓动之下,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如秋瑾、向警予等一批女中豪杰。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男子,女子基本上是男子的追随者。这主要是由于

中国社会女性群体所受压制和毒害是罕见的,她们被禁锢在家庭中,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当然她们在某些方面不如男子,“女子之开通,亦迟于男子。”<sup>②</sup>因而近代妇女解放中觉醒了的男性充当了开路先锋,但真正要实现女性解放,还必须依赖于女性自身的觉悟和奋斗。1912年孙中山就曾告诫女界:“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们利用也。”<sup>③</sup>1911年廖仲恺在《妇女解放从哪里做起》一文中也说:“无论要造一个解放,总要靠自觉,自己要求,自己奋斗。从道德上、知识上、体育上准备过自己解放的手段,一面自己去解放,一面自己去准备,这解放才有点光明……我主张女子自身的解放,就是这个道理。”<sup>④</sup>

现代妇女解放强调妇女自身的解放。社会和男性只能解放女性生存的外部环境,女性自身如果缺乏内在的解放要求,外力给她带来的解放,只能使她漠然处之,身处解放而不自觉,随便而又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已经得到的权利。因而女性自身要强化主体意识,担负起解放自己的责任。

### 四、普遍关注女性的社会权利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主要集中于要求社会权利上,而且把争取婚姻自主权作为获得解放的起点。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压制女子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理不宜”,要为女子“呼弥天大冤”,“拯沉溺之苦”,使之同享“大同之乐”。提出女子能接受教育,参加考选,允许妇女参政,提任官职,婚姻自由等。具体如下:

(一)婚姻自主权。早在维新派那里,婚姻自主权就被提倡。谭嗣同不仅主张婚姻自由,而且提出若夫妻不合则可以自由离去。五四时期婚姻自由问题更受到进一步关注,人们反对包办婚姻,主张婚姻应由当事人自主。为此,还提出了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等,以便为婚姻自主创造条件。这一时期也有不少觉悟了的女性,不断抗争去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如郭隆真、向警予等。通过这些活动,从思想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二)教育权。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对这点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女子智力并不差于男性,他们一旦接受教育,了解天下大事,开阔了视野,智力将被开发出来。维新派还极力兴办女学,梁启超论述了女子职业与女子教育



的问题,并且将职业、教育与富国强民联系起来了。

(三)职业权。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钟》一书中提出了妇女应争的六种权利为“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等。其他思想家还从国家与妇女的双向角度提出,中国积弱是由于分利人太多,女子是分利之人,因为她们没有职业。秋瑾则认为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学艺与合群。她强调女子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

(四)参政权。20世纪初期,近代中国女性参政运动有二次高潮,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第二次是在五四时期。女子参政运动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尽管近代中国的两次女性参政运动都失败了,但妇女们争取参政权的斗争意义重大,它冲击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也种下妇女参政的理论种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本身。及至后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有“于法律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的原则”的规定。

(五)结社权。女性认识到了“结社”的意义。秋瑾强调,妇女一方面要自立,另一方面要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团体,“结二万万大团结于一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们组织了共爱会、女子国民会、女子参政同盟、女子教育会等数十种妇女团体,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她们不断组织妇女团体。如1903年拒俄运动中,留日女学生组织了集宣传与救护于一体的救护队;在1911年的保路运动中,四川妇女成立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武昌起义后,妇女们成立了从事抢救革命军伤员的赤十字会,为支援革命,妇女们成立了以争取军响为宗旨的协赞会、劝捐会等。辛亥革命确实凝聚了广大妇女的血汗。

五四运动中,妇女团体也纷纷成立,北京有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天津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长沙有以“增进女界的幸福,提倡女子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宗旨的女学

生励进会等。妇女团体与其他爱国团体组织密切合作,并肩战斗,推动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的向前发展,

中国妇女团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十分重视组织的传播功能。1897年,一些有维新思想的妇女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并创办了第一张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从1902年到1912年,妇女报刊近40种,妇女报刊对唤起妇女的觉悟,号召妇女起来参加革命具有积极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和地位。女性解放的任务是更多地注重妇女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使她们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让她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证实自己的价值。这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所副教授、博士)

注释:

①《南学会问答》,《湘报》第50号。

②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

③、④、⑤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0、312、304页。

⑥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

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916页。

⑧《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⑨《胡适散文》第1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⑩《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0页。

⑪参阅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⑫《正俗篇》,《时报》1905年2月12日。

⑬《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8页。

⑭《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